

第八章 满 族

第一节 概 况

一、人口分布与语言文字

四川省的满族,根据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共有 12195 人。其中 4266 人集中在成都市,占全省满族总人口数的 35%。重庆、攀枝花两市共有 2748 人,占总人口数的 22.5%。其余分布在绵阳、自贡、泸州、宜宾、万县、涪陵、江津、凉山等八个市、地、州。四川省的满族绝大多数是城市职工和城镇居民,只有极少数的满族人口从事农业。

满族原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文是 16 世纪末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的。历史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满族由于长期散居在汉族中间,和汉族交往增多后,满族普遍习用汉语、汉文。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满文被废除。现在,只有黑龙江个别边远乡村的少数老年人还会讲满

语,其他地方的满族一般都通用汉语文,在今天推广的以北京音为基础的普通话里,满族有其独特的贡献。

四川省的满族,至今只有极少数 80 岁以上的老年知识分子识得几个满文字母,能讲几句简单的满语。有的满族家庭虽然还保留了亲属关系的满语称呼,但在生活习惯上和当地汉族人民已没有什么差别。四川满族从其家庭成员来看,80% 以上都有汉族成员,几乎 100% 的家庭都和汉族通婚。

二、职业状况和文化教育

四川满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的满族知识分子人数所占的比例都居四川各民族的首位。据 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每 1000 名满族从业人员中,从事科学研究、工程技

术、农业技术、医疗卫生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 384.6 人,汉族每千人中的专业技术人员为 37.8 人。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四川满族专业人员的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比重也较高,拥有不少的工程师、教授、医师、作家、艺术家等。其中有在某一学科和科研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满族专家、学者。如中医骨科专家杜自明,医学造诣深,继承和发扬了满族、蒙古族传统的治疗骨伤医术,自成流派,是全国著名的中医学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研究院整理的《杜自明治疗骨伤经验总结》和《杜自明骨伤治疗手法》的教学片,都是具有较高科研价值的重要医学资料。

四川满族广泛地参加各项社会经济活动。1949 年前职业不稳定和遭受失业的痛苦,“主要是卖泡菜、卖香烟、卖红薯、卖破烂”。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据成都市真武宫 70 户满族的家庭历史材料的调查统计,清末当小商贩的就占 80% 以上。在 38 户、70 名满族市民中,失业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40%,职业不稳定而受到失业威胁的约占 47% 左右”。四川满族劳动人民生活贫困,90% 以上的满族子弟无钱上学,其他文化生活则更谈不上。

50 年代以后,四川满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满

族人民过去失业和半失业的现象已荡然无存。据 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现四川满族人口中除去在校学生、退休人员及家务劳动者外,在业人员已占其 15 岁以上人口的 75.18%。并且人口的职业构成也有了崭新的面貌。根据对 15 个行业的抽样调查,从事于制造业的占满族全部在业人员的 43.8%,居第一位;其次是矿业开采、电力通信、地质勘探、交通运输、卫生体育等行业,共占 28%;第三是建筑业,占 10.08%;第四是文化、教育、艺术事业,占 7.29%;第五是商业、服务行业,占 6.62%;此外,仅占总人口数 4.17% 的满族人口从事于农、林、渔、牧业。

满族是重视教育,善于学习的民族。50 年代以来,四川满族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知识分子集中在满族上层社会而劳动人民文盲众多的状况。据 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四川满族人口文化结构状况是:每 1000 人中拥有大学生 78.29 人,高中生 263.19 人,初中生为 298.94 人,小学生 234.17 人。在四川 12 岁以上的各族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所占的比例数为:满族占 6.3%,汉族占 30.93%,其他各少数民族的平均数为 62.63%。四川满族的文化教育程度处于四川各民族中的领先地位。

第二节 民族发展

一、四川满族的来源

满族的故乡在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清朝中叶,派兵驻守全国各重要城镇和军事要塞,八旗驻防星罗棋布,满族的分布也就遍及全国了。

四川满族,主要是清代驻防成都的满族八旗兵的后裔。四川之有满族始于清康熙年间,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西藏骚乱,康熙诏命平逆。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调湖北荆州驻防旗兵3000名来川,康熙六十年(1721年)选留1600名永驻成都,成都这才有了驻防旗兵,这些旗兵中的满族官兵是四川最早的满族居民。驻防旗兵三年一换,后因交通困难,最后一批也就不再换防了。清王朝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在成都设副都统衙门(后改为将军衙门),由法喀任副都统。不少满族文武官员渐次调到四川各地供职。此后旗兵眷属陆续迁入四川,直至乾隆初年。旗兵及其家口共计5000余人,即在成都定居下来。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与变化,成为今日成都的满族,即形成了四川满族的主要部分。

二、清代四川满族的军事组织与军事制度

八旗是清王朝建立的军政合一的

社会组织。将所辖居民分为黄、白、红、蓝四旗,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为八旗。八旗制度则是管辖旗人的兵政合一的军事制度。

(一)驻防旗兵的编制与人数

成都驻防旗兵的最高长官是将军或都统。下设副都统1~2人,副都统下有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诸职,逐级掌管平时旗营官兵训练、教育及旗营诸事务。此外,直属将军或副都统衙门管辖的还有左右两司,分别负责办理官员升补、调任、旗营编制、旗兵训练、官兵粮饷、户口及装备等事务。官兵的编制共计72员。此外,另设理事同知1员(专司旗汉讼事)、笔帖式2员(专理文书),俱系文职。

成都驻防旗兵共编为24甲,1旗下率3甲。旗营士兵的编制主要有:委前锋校、委前锋、甲兵、委甲兵、炮手、匠役、步兵、养育兵、余兵等。

附:额设员兵情况:

成都将军1员,副都统1员,协领5员。

佐领19员,防御24员,骁骑校24员。

笔帖式2员,委前锋校8名,委前锋152员。

甲兵1296员,委甲兵240名,炮

兵 48 名。

匠役 400 名, 养育兵 384 名, 余兵 500 名。

(二) 旗兵的军事生活

驻防成都的满洲八旗兵, 既是清朝统治者镇压四川人民的工具, 但本身又是被压迫者和被统治者。他们是被强制入旗当兵的, 清制“八旗子弟人皆为兵”, 清代八旗兵的军事生活制度, 乃是平时牧畜, 战时召集成军, 入关以后分拨各地。驻防便成职业军人, 代代都靠粮饷生活, 不能搞其他生产。并规定, 旗兵按日操练, 勤于射击, 轮流值班, 谨候差遣。成都“满城”内各驻防兵丁, 除有军事行动外, 便孤守满城。旗兵平日除看守四门外, 还要到各级衙门服役。八旗官兵每年春秋两季均要在西较场内的演武厅进行大型操演, 月朔凌晨, 齐集大衙门, 听读“圣谕广训”, 接受忠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其余时间, 都在所属的前锋营箭厅练习, 甲兵由佐领检阅, 前锋由主管协领检阅。满城内旗兵没有指派的外出差务, 未经告假, 不准离城 20 里, 擅离营地便以逃旗论处。并且还规定, 不准旗兵与汉人接触, 不准务农、经商, 也不准学习其他技艺。严格的八旗军事制度和军事生活使广大满族旗兵陷入无工农商贾之业可执, 谋生路寡, 仕途门狭的窘境之中。

(三) 旗兵收入和旗民生活

辛亥革命以前, 满族的经济生活

是和军事生活密切联系着的, 他们经济的来源主要是依靠旗饷。满族旗兵代代靠旗饷生活, 旗饷为银、米两种。饷以月而计, 又称“月饷”。米以年而计, 又称“年米”。根据兵种不同, 饷银和饷米的数额也不一样。

从康熙到嘉庆时期, 旗兵待遇比较优厚, 生活也比较稳定。成都驻防的旗兵每人每月有粮饷, 其中以马兵待遇为最高, 每月收入可养五口之家; 养育兵为最低, 每月收入可养一口人。

鸦片战争以后, 由于清政府财力枯竭, 八旗士兵的粮饷时无保证, 加之满族官员的窃取、克扣, 士兵的收入实际上得不到应有的数目, 常引起士兵的不满。清光绪三十年腊月(1905 年 1 月), 在“裁停旗饷”的消息刺激下, 成都发生了“将军衙门事件”。事件发生在一天早晨, 旗兵操练完毕之时, 有一旗兵突然站在台上向所有旗兵说: “到将军衙门去, 找将军要饭吃去。”在他的倡导下, 部分旗兵即随同前往将军衙门, 门卫不让进入, 遂与门卫发生了冲突。四川总督赵尔丰闻知此事, 派其亲信——巡防军镇压。事件传到旗兵驻防区, 所有旗兵立即前来支援, 赵尔丰被迫答应了旗兵的条件, 事件才算平息下去。

辛亥革命以后, 旗营解散, 旗饷停发, 八旗制度彻底崩溃, 平日只能当兵吃饷的八旗兵丁开始了痛苦的转化。八旗制度使多数满族人不具备谋生的

技能。他们经商无力,学艺又一时难成,绝大多数满族旗民的生活陷入困难的境地。据记载,当时典当过衣物的满族占成都满族的50%以上。更有甚者,将所有物件变卖糊口,无可折卖时,衣敝履穿,形同乞丐。一些满族人为了谋求生存,暗地里做些小生意,如“卖红薯”、“卖泡菜”、“卖针线”等。还有一些靠出卖劳力为生,如拉人力车等。据调查,当时在成都市真武宫的38户满族中,拉人力车的有18户。其中有父子拉车者10户,兄弟2人共拉者7户。仅真武宫一处,一年中即饿死10多人,有的一家3口均被冻饿而死。

三、清代成都“满城”的状况及民族关系

(一)成都“满城”的设置

清代,在八旗驻防之地为驻防旗人修城别居,人们习惯称之为“满城”。对附近老城而言,称之为“新城”或“少城”。

满城有两式:一是在驻地府州县治附近数里,别择一地建城。一是在较大的府州县治内独划一隅,迁原汉民于外,内筑界墙或设界堆以别之。清代成都的“满城”即属此式。

成都“满城”始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为当时四川巡抚年羹尧调征四川省内各州县的官吏、乡民捐资出力修筑的。在成都大城内,筑城垣长约四里五分,城墙高约一丈四尺,内居满族、蒙古族旗兵,汉民称之为“满城”。

满城位于成都城西。在“以将军衙门为中心,南起君平街、小南街;东自半边桥至东城根街;北至八宝街、小北街;西至同仁路,方圆约10里的范围内。”满城四周城墙耸立,有城门四道。南有安阜门(即小南门),北有延康门(即小北门),东有受福门(即羊市小东门),西有迎祥门(即御街小东门)。迎祥门城楼上挂有两道大匾,均为白底黑字。向着满城里的那道匾上书有“少城旧治”,向外的那道上题有“既丽且崇”几个大字。

将军衙门,既是满城的腹心之地,也是城内最重要的军事衙署,为乾隆四十一年增设将军,四川总督文绶设置。内有头门,匾额上写“帅府”,二门上写“仪门”。二门以内有堂五:大堂、二堂、三堂系办公之地,大堂前的牌坊刻有满汉文写的“控驭岩疆”四个字。四堂、五堂是内室。在将军衙门的大门上悬挂有“望重西南”之匾额,衙门前后都有八旗步兵营。衙门气势巍峨,俨然王府。

满城内共有40多条街巷驻有满族旗兵。各条官街内有数条驻扎旗兵的小巷,小巷依北方旧习称之为“胡同”。据清时记载,当时成都的满城内“各胡同左右排比,如蜈蚣之足,城内景物清幽,花木甚多,空气清新,街道通旷”。从南到北,将军衙门宛如蜈蚣之头,长顺街是身,排列在左右两侧的各街巷如蜈蚣之足。长顺街以东为左

侧,依次有今八宝街、东二道街、半节巷、过街楼、红墙巷、东马棚街、东门街、长发街、黄瓦街、商业街等。长顺街之西为右侧,排列有今西大街、西二巷、三道街、四道街、焦家巷、西马棚街、吉祥街、奎星楼街、栅子街、实业街等。城内8条官街、33条胡同,其中一部分取有名称,另一部分则依顺序称为一、二、三、四……道街。

当年的满城内除有各级官衙兵房外,城内还有八旗米仓、火器库、各类八旗书院、祠堂寺庙等建筑,以及各旗设置的小型练功场地,如弓房、箭亭等。满城四门锁钥由将军等各级衙门直接掌管,城门昼夜有领催(满语:拔什康,兵营中的班长)、士兵轮班严守,鸡鸣而启,鸡眠而闭。清代的成都“满城”实际是一座大军营。

(二)民族关系的变化

清代驻防旗人的主要成员是满、蒙古、汉军八旗兵丁。一旗所率的甲数不等。成都驻防八旗以三甲为一旗(其他城镇有五甲或八甲为一旗的),一甲、二甲为满兵,三甲是蒙古兵。当时,成都驻防八旗只有满族、蒙古族,没有汉军八旗。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大小金川乱事平息。成都驻防八旗才增设将军,设立将军衙门。除统率满族、蒙古族八旗驻防外,还统辖汉军。成都驻防八旗的上层与汉族官员和知识界的往来日趋频繁。当时,在八旗高等

小学堂已开设汉文,由汉族教师任教。汉族学生也有来此就读的。同时,不少八旗官家子弟到汉人开办的学校读书。随着满、蒙、汉各族之间的广泛接触和交往,“清语骑射”的满族传统文化逐渐被淡化。在八旗里讲满语的人逐渐减少,讲汉语的人则越来越多。那时在四川广泛流行的哥老会已有旗人参加并当首领。满、蒙、汉族之间构成了同窗、门生、故旧、部下等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

随着民间交往的逐渐增多,四川满族在光绪年间已开始与汉族通婚。不过,当时只娶汉族姑娘,满族姑娘不外嫁;到辛亥革命以后,满族姑娘外嫁比娶进汉族姑娘要多。在一些满族家庭中,婚丧节日的繁琐礼仪大大减少了,甚至连请安和满语称呼家人的习惯也不保留。有的满族改变族籍;有的满族使用汉姓。满族的姓氏是按居地的地名或旗名称呼的,叫做“哈喇”。辛亥革命以后,四川满族很多人都将其原“哈喇”或按意译,或按音译改为了汉姓。

四、近代四川满族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一)辛亥革命前夕成都满族知识分子动态

成都地区的满族于1904年前后,已有部分富家子弟、八旗世袭后裔进入四川高等学堂、四川武备学堂、铁路

学堂、警察学堂等等。那时成都的八旗官学和义学都分别改为学堂，“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所授科目有数学、理化、英语、国文、音乐、图画、体育等等，西方的自然科学成为学堂的重要课程，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也在学堂中传播开了。在学堂任教的多半是有一定进步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们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辛亥革命前后，上学堂和出国留学成为满族知识分子社会中的一种新的时尚。与此同时，满族青年逐渐认识了清廷的腐朽，不断增强爱国主义思想。那时的少城书院，在祠堂街（今四川电影院）与关帝庙（原成都市图书馆）相对处，满族学生泰安听到有讲变法的知名人士即前往从之。满族教师杨卓甫，在课堂上公开讲授“清廷腐朽，列强瓜分中国”等。多数青年学生参加了辛亥革命前夕的反帝爱国政治运动，满族社会产生了要求变革的氛围，酝酿着反对清廷的情绪。

（二）四川保路运动

1900年以后，作为辛亥革命前导的保路运动开始了。川汉、粤汉铁路都是由各省集资筹办，四川是按地租的3%出谷米作为铁路股本。在“国有”的名义下，这些铁路被清廷没收干净，路权又被清廷卖给了帝国主义。1903年，清廷准备将川汉铁路的建筑权出卖给英国，四川人民立即起来抵制，自动筹集股款，着手修筑川汉铁

路。四川的许多满族人士都成了股东，一些农民也买了股票。1911年5月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订立筑路合同。四川已经筹集的铁路股银，全不发还。对这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侵吞民众集资的规定，四川各族人民强烈反对。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保路同志会，后改为保路同志军。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保路同志会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出版报刊，散发印刷品，向全省各地派出讲演员，还派人到外省联络。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并申明：并不是反对“路归国有”，而是反对“名则国有，实则外国所有”。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赋予四川保路运动以强烈的反对卖国、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主义精神。

9月，清廷一方面派军队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一方面命令四川总督赵尔丰加强镇压，并多次要求驻防成都少城的满族将军玉昆调八旗兵相助。玉昆深不谓然，按兵未动。成都驻防八旗士兵，大都不愿与新军作战，其中还有人同情革命并支持革命。这就使旗营避免了参加对保路同志军的镇压，为辛亥革命中成都旗营“满城”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

（三）成都“满城”的和平解决

1911年9月7日，赵尔丰对成都民众的请愿进行了血腥镇压，在督署

前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激起了全川民众、特别是保路同志军的愤怒。四川人民将保路运动推向武装斗争的形式,经过成都附城之战、雅安起义、荣县等 57 个州县的独立,赵尔丰的巡防军已危在旦夕,无力抵挡革命的同志军。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四川后,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进一步高涨,11 月下旬,重庆“蜀军政府”、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相继成立。12 月 28 日,巡防军哗变,赵尔丰被杀。此时,成都旗营尚未解除武装,“满城”严闭自守,旗兵不断在东城根街、八宝街、南较场一带巡防,三营士兵则防守各城门。与此同时,大汉四川军政府于“满城”四周布重兵,防守在西御街的川东公所、南较场的城墙及君平街、小北街等处,战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满城”中有主战者,也有主和者,玉昆意未决,令旗兵勿妄动,不得鸣火器。“满城”暂时保持着一种不绝如缕的和平态势。

战事迫在眉睫,一些比较开明的满族、汉族人士便出面谋求和解。当时,满族知识分子赵惠明,同汉族谋士徐炯,把和平解决成都旗营的方案提到驻守“满城”的将军玉昆处。玉昆有允意,并指定赵惠明等人共同做旗营的工作。他们召集满族各界代表人物开会 10 余次,商议“和解”之举。同时,军政府亦派代表来宣讲民族政策:“优与保护,决不妄杀旗人。”劝令旗兵

放下武器。当时四川满族哥老会首领与民军中会党有联系,互通声气,促进和解之议遂决。赵惠明等人在西较场召集旗兵,讲述争取投诚、旗营和解的好处。旗兵皆放下了武器,于是成都战事得以和解,成都“满城”和平解决,未造成满、汉人民的伤亡。这样,“清朝的统治首先在四川被人民突破了”。

辛亥革命前夕,散居四川各地的满族人民和其他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有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要求。从辛亥革命揭幕之时起,四川满族人民就和汉族及其他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站在斗争的前列了。

(四)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活动

在经济崩溃和政治破产的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工人的罢工斗争,学生的罢课游行,人民的武装起义,形成了一股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强大洪流。当“五四”爱国运动、“反饥饿”民主运动在成都等地相继发生以后,四川满族各阶层人民奋起战斗在这一斗争的行列。

四川满族工人阶级的形成。满族工人阶级的出现比较早,它几乎是与汉族工人阶级同时出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增加,使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这时期也正是辛亥革命以后,城市满族

社会分化最急剧的时候。在满族市民中人数最多的,还是原先的旗兵和余丁,自从停发粮饷以后,他们便开始自谋出路。一部分旗丁当兵、当警察、当勤杂人员;大部分则作小生意,拉人力车,当泥瓦匠。妇女做各种手工活,当佣工的也很多。找不到固定职业,是当时满族市民的最大痛苦。虽然如此,满族从事劳动生产的人,毕竟是增加了。手工业工人在特种工艺、钟表修理、鞋帽制造、木材加工、土木建筑等行业中,比较集中;还有一部分参加了近代工业生产。在成都、重庆、涪陵等地,在这些地方的满族市民中出现了一支具有生产技能的劳动队伍。他们走进了工厂,在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中,满族工人也在不断地壮大成长。在厂的不少满族工人和汉族工人一起进补习学校学习,在这里,不仅学习了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逐步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提高了自己的觉悟。他们参加工会,积极地参加了工人运动。在波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参加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满族师生参加“反饥饿”运动。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处于饥饿与死亡线上的满族人民,为了争生存而参加了民主运动。1947年5月,在成都,各大、中、小学的满族学生都参加了以四川大学为首所掀起的“反饥饿”运动。据调查,参加游行的满族教师有30多

人,占当时成都市满族教师总数的60%以上。满族学生写标语、做旗子,参加罢课、示威游行,师生们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幅标语,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采取野蛮手段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不少师生利用罢课之时,在街头巷尾演讲,发放传单,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在反“饥饿”的运动中,接受了新思想的满族师生,爱国热情进一步高涨,他们和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知识分子一道,共同酝酿着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新高潮。

“满族青年自学会”的革命活动。成都“满族青年自学会”,成立于40年代末,以后改名为“满族青年进修会”。当时参加这一组织的有陈林涛、穆仁溥等满族青年30余人。他们组织学习党的土地政策、创办刊物、散发传单,明了时局和任务,组织起来参加各种争取解放的活动。1947年以后,成都有许多满族青年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苏继成同志在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组织成都的满族青年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党组织派他深入“满族青年自学会”,进行了较长时期的组织领导工作。

此外,还有安琪等满族青年于1946年奔赴解放区,献身于革命事业。

长期以来,散居四川各地的满族人民和其他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遭

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有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要求。满、汉人民社会政治地位的一致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接近,使满族人民和各民族人民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五)民族关系的变化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满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日益增强,民族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少,共同性进一步增多。

语言文字方面 辛亥革命以后,满、汉人民杂居共处,在一个经济整体中共同生活,相互学习生产劳动技术,有着文化上的共同交流。满族人民迫切要求学习汉文化,许多人为了直接吸收汉文化而逐渐放弃了学习满族的语言文字。满族人改汉名的越来越多,也就逐渐代替了满名。辛亥革命以后,满语、满文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消失了。

风俗习惯方面 随着满族语言、文字消失,居住四川的满族人在风俗习惯方面与当地汉人已无多大的差别了。满族有些传统习俗在辛亥革命以后也逐渐消失,例如:“请安”、“跳神”、“祭祖”等等。此外,在满族的婚丧嫁娶节日里,一部分繁琐的礼节仪式大大减少了。在饮食、居住、服饰及头饰等方面均与汉族多已类似。

日常生活方面 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人民大量参加了劳动,和汉族人民

在共同的生产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时,有不少汉族人民伸出友谊之手帮助满族兄弟安家立业,教给他们生产技术。许多人还互相结亲,认干爹、干妈,每逢岁末年初或吉祥节日则互相拜访,互赠礼品。

四川的满族原来与汉族是不通婚的。在满族本民族内部,富贵之门也不嫁给贫寒之门,官家也不嫁给兵户之家。但是,由于满汉人民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长期地生活在一起,发生通婚的现象很早就已经存在了。辛亥革命以后,满、汉通婚已没有任何限制,双方均有嫁娶。

满、汉风俗的同一过程,是两族人民长期杂居共处,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自然融合的结果。在辛亥革命后,满族和汉族的文化已经基本融合在一起,这是满、汉两族文化交流和满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并且更有利于满、汉两族人民友好往来,便于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六)经济生活状况

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满族人做工无艺,务农无地,经营无贷,只好靠卖劳力谋生,蹬三轮、拉人力车等是他们不得不从事的职业。他们被认为是“下等职业者”,常常受到国民党军官、官吏、豪绅及资本家的侮辱,其心理状态是“三不敢”和“二怕”。即:“阴天、雨天不敢出去;小街、小巷不敢去;路

远、出城不敢去。”“一怕军警打骂，二怕抓去当壮丁。”事实上，车夫挨打受气的事屡见不鲜，他们成天拉车奔跑，挣几个脚力钱，除去租车费已所剩无几，甚至不够一天的饭钱。据调查，在真武宫 38 户、70 名满族中，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稀饭的占 80%，这就是当时成都满族贫民吃的“对时饭”。由于过度的劳累，不少人咯血而死，仅在 1948 年~1949 年间，成都真武宫就这样死去 5 人。

失业者的生活情景是：“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常年穿不上一身衣，睡觉无床地上躺，身上无衣披草席。”迫于生活折磨而惨死者不乏其人，仅真武宫一处，在 1948 年就饿死 10 多人，有的一家 3 口都饥寒而死。至于卖儿鬻女之事，也时有发生。

由于贫困，许多满族男子结不起婚，在真武宫内约有一半的男子是单身汉。他们住在庙殿的神像后面，终年忍饥挨饿。

1949 年以前，成都满族执教、行医的约有 40~50 人，其中有中学教员 7~8 人，绝大多数为小学教师，还有极少数在大学任教。据 10 位曾当过小学教师的人回忆，他们的月收入为每月 4 市斗米，只够买一件粗布衣服。他们说：“穿了衣服，吃不饱饭，还随时受到被排挤的威胁。”

在成都的满族人，许多是“卖泡菜、卖香烟、卖红薯、卖破烂”的小商贩。他们要受四种限制：一是受市场的限制，做小本生意一天卖不了几个钱。二是受气候的限制，天气一冷身上没穿的，不敢出门。三是受天黑限制，经营者多为妇女或老年人。四是受物价上涨的限制。在物价一日三涨的岁月里，小商贩无利可图，而且物价一涨，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赔钱。同时，还经常遭受国民党军警的敲诈勒索，生活十分难熬。据对成都市真武宫 8 户满族小商贩的资金统计，其中没有金额在 5 元以上者。

第三节 当代四川满族的政治及经济生活

一、政治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政治上切实保证了民族平等权利。1952 年中央颁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

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明确指出：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都分别予以禁止、更改或收管。并宣布不提“满清”字样，“清”是指清朝，“满”是指满族人民，两者不能混为

一谈。要把广大满族人民同清朝统治者区分开来,以避免伤害满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四川满族完全和当地的汉族人民一样,享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等自由权,同时也充分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发挥了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作用,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到1959年,满族中已有四川省人民代表2人,成都市人民代表2人,四川省政协委员1人,成都市政协委员1人。此外,在省、市、区妇联、青联等机关和人民团体中均有满族干部。杜琼书(女,骨科专家)、赵尔密二人就是四川满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在历届成都市各区县人民代表中,有满族代表46人;历届成都市人大民族委员会有满族委员3人;成都市少数民族联谊会有满族委员9人。

1949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先后涌现出许多满族先进人物。其中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人物、省市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20余人。1982年受成都市表彰的满族先进生产者有4人;1987年受成都市表彰的民族团团结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中有满族代表16人;1988年出席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人物表彰大会的有四川满族代表2人。据成都

市不完全统计,已有满族党员43人,此外还有不少满族青年工人、学生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四川满族群众积极参加街道及社会治安保卫工作,他们在基层人民政权的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成都市满族人民代表关培德协助做好居民委员会的各项工作,经常向满族居民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他所处的地段,没有发生过盗窃、火灾、交通等事故。关培德多次被评为治安模范,受到政府的好评和群众的爱戴。成都市真武宫满族李炎华被选为居民委员会委员,积极肯干,曾多次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在1956~1958年间两次被评为成都市治安功臣,荣获人民政府的奖励。

二、经济生活

(一)就业

1949年以后,满族人民迅速地摆脱了职业不稳定和失业的威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3年成都市就介绍了75名满族青年参加机关、学校、团体等单位的工作。与此同时,对就业素质较差的部分满民或进行就业培训,或组织他们参加各种街道主办的生产劳动。

1957年由中央民委拨专款5000元,在成都开办了“满蒙人民汽车修理厂”、“满蒙人民缝纫生产组”、“满蒙人民布壳生产组”以及“满蒙人民木材运输组”等劳动就业部门,组织和吸收广

大满族市民中的无业人员学习生产技术。这些生产部门仅到 1958 年底,就已创造产值达 1659707 元。从此,居

住在成都真武宫、关帝庙、同仁工厂中穷苦无靠的满族贫民,有了职业,开始了新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成都部分满族职业变化情况表

2—20

项目 年度	户数	人数	劳动力	产业工人	手工业工人	小商贩	机关职员	人力车夫	失业
1949	38	70	48	0	0	8	0	18	22
1959	48	102	42	20	7	12	2	1	0

注:1、解放后的人力车系三轮车。

2、本表不包括学生在内。

(二) 贫困救济

人民政府一方面积极领导和帮助满族人民从事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对一些困难的丧失劳动能力的满族人民发给救济金和实物。据 1953 年成都市的不完全统计,得到救济款的满族群众共计 39 人。其中得到一次的 8 人,得到 2 次的 6 人,得到 3 次的 11 人,得到 4 次的 10 人,得到 5 次的 4 人。在真武宫、民生里的满族总人口中,约有 80% 左右的满民得到过人民政府的救济。有的还得到特殊照顾,由人民政府发给棉衣、棉

被、单衣等物。他们感激地说:“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才真正关心我们满族人的生活。”1957 年,成都市民政局负责同志还亲自到民生里调查了解情况,拨给专款修补房屋,改善了满族市民的生活和居住条件。

四川满族人民的生活,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变化显著,而且在 50 年代后的几年中也有较大地改善和提高。以真武宫、民生里和乡农寺 3 个点的 15 户满族调查为例,其 10 年间的变化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成都部分满族生活条件变化情况表

2—21

年度	总户	总人数	工资总收入	公债	被褥	棉衣	毛衣	单衣	蚊帐	皮鞋	胶鞋
1949	15	36	157	0	7	25	0	69	4	0	0
1959	15	59	1024	464	38	63	21	169	17	26	31

(三)文化及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收入逐年增多,广大满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及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相应地改善和提高。

满族学生在报考中等以上专业学校时,在同等条件下,得到优先录取的照顾。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国家发给助学金或免收学费。仅在1953年间,成都市就有16名满族男女青年入学深造。50年代以前,在成都地区的满族劳动人民子女中,少有在校学生,而50年代以后适龄满族儿童大都能上学读书。1958年在真武宫办起了一所小学,在校满族学生有20多名。此外,政府还开办夜校、业余学校、速成识字班等,通过多种途径帮助满族人民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在医疗卫生方面,满族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他们的居住条件及环境卫生状况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级人民政府免费发放药物在满族集中居住区消灭蚊蝇。与此同时,医疗卫生部门还定期去真武宫为满族群众打预防针,防止疾病发生。这里的满族积极响应党和政府提出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号召,经常开展卫生评比活动,并涌现了不少先进模范人物。成都的真武宫、乡农寺、民生里等院落都被评为卫生模范单位,并且在报上受到表扬。昔日被称为“叫花子”院的

真武宫,50年代以后修葺一新,每家每户、屋里屋外都干干净净,“爱清洁,讲卫生”已成为广大满族劳动人民的习惯。

在良好的卫生环境和精神心态的影响下,四川满族人民的健康水平也迅速得到提高。满族人口逐年增长,到1958年,真武宫已有满族102人,较之1949年以前的70人增加了60%左右。人民政府不仅为满族劳动人民提供免费医疗,经常打预防针,而且还组织专人照顾和帮助孤寡老人的生活。

四川满族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从事医疗卫生、科研教育、文化艺术的满族知识分子相当多。据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90年统计,在四川的少数民族高级专家中有满族115人,约占全省少数民族专家总数的18.5%。其中有教授级专家16人、副教授级99人。其职业分布状况为:研究员1人,副研究员2人;教授8人,副教授18人;主任医师3人,副主任医师7人;一级编剧、一级文学编辑各1人;一级演员2人。此外,还有不少专门人才活跃在科技文教、经济、体育文艺等领域。随着四川经济建设的发展,在成都、重庆、涪陵等地的大中型企业中,也有一定数量的满族干部和职工,他们为振兴四川经济,促进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第四节 习俗及信仰

一、服饰、饮食、居住、婚丧、节日

风俗是一个地方或民族长期形成的风尚习惯,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在长期与汉族杂居的四川满族,许多习俗已与汉族趋于一致,但在衣、食、住及婚丧节日等方面,仍保持了固有的民族传统。

(一)服饰

清初满族衣袍式样特点是无领、箭袖、左衽、四开衩、束腰,处处显露出骑射民族的风格。在满族南迁至辽沈、入主中原进至四川后,与汉族杂居共处,服饰受汉人“大领大袖”的影响,窄袖长袍已不适于下水耕田作业,箭袖变成了喇叭袖,四开衩变为左右开衩。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代表固有习俗的箭袖袍也时兴时废。辛亥革命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满族男女都穿直统式的宽襟大袖长袍。女性旗袍下摆至小腿,有花卉等纹饰,男性长袍下摆及踝无纹饰。40年代后,旗袍又经历了一次变化,男性旗袍被废弃,女性旗袍式样变化,逐步形成今天的样式。在以旗袍为主要服饰的旗装中,还有一些极富民族特色的服装为满族人民所喜爱,如马褂、坎肩、套裤等。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带袖坎肩——“鹰膀”,它以天青二蓝为上色,为八旗

子弟骑马之着装,式样剽悍大方。

(二)头饰

最能表现四川满族独特民族气韵的要算头饰。满族少年到结婚年龄,则剃去前额短发,只留颅后发,梳成一根长辫垂于脑后,这种发式一直保留至清末。在清统治近300年中,“剃发梳辫”为满、汉等民族的共同发式。满族女性发式不同于男子。未婚时额前发将鬓掩住,婚后才显出来。一般旗女以梳两把头为常,即将两边头发都捋到顶心,然后从中央分开,头两边各绾一个髻。除此之外,脑后发还绾起,紧贴后脖颈,呈燕尾形,故称燕尾式。这一发式配上高领旗袍,看上去体态雅致,挺直潇洒。

满族戴帽因季节不同而异。夏天戴凉帽,冬为冬帽,也可戴便帽。便帽是圆形六瓣,这是取“天下六合一统”之意。帽顶上还有红结或黑结。

满族女子无缠足之苦。清朝时候,妇女足履高底木质的旗鞋,男子则穿靴。官员着方头靴,一般旗人着尖头靴。至民国时,男子多着便鞋,妇女喜穿绣花鞋。

(三)饮食

四川满族的饮食文化也颇富民族特色。主食品种丰富,特点是酸、酥、

粘、凉。最喜欢吃的是饽饽,满族多以做饽饽的多少来互相炫耀,以示丰足。饽饽种类较多,形状各异,有豆面饽饽、苏叶饽饽、牛舌饽饽等。有些满族食品还深受其他民族喜爱,如“萨其玛”、“驴打滚”。此外,火锅也是四川满族传统的饮食风味,自清以来一直传承不衰。成都地区火锅多以羊肉为主料,俗称“涮羊肉”,同于北方。四川满族喜食肉类,而以猪肉为大宗,不同于北方;但也有牛羊肉。如以羊肉为原料的“全羊席”,则更是满人的佳肴盛宴。烤制或熏制肉食也是满族的传统风味,如红烧肉、熏鸡、烧鸡。满人还喜食酸菜,爱饮酒,用酒泡药材之俗尤为盛行。

(四)居住

成都满城位于大城以西,始建于康熙 57 年(1718 年)。由于清王朝的禁令,大城居民不允许进入满城,满城内的满人不允许与大城外沟通来往。城内街巷星罗棋布,绿树成荫,金河穿城流过,是个风景独特的满人居栖地。一排排的官街胡同不像汉人住房那样鳞次栉比,而是每户人家都有座庭园,每个庭园相间数米,空隙处种花植树,庭园中还挂了一排排鸟笼。种植花草以及养鸟已成为当时四川满人的民风。每户院子中,还竖了一根一丈多高的“梭罗杆”,杆呈黑色。在高杆顶约五寸处,设一杆斗。每逢祭祖时,杆斗内的五谷杂粮与动物肝脏用来喂乌

鸦。因为在满人眼中,乌鸦是恩鸟,是否极泰来的象征。民国时期,由于特权中止,迫于生计,四川满族中的一些下层民众不得不搬出“围城”而与汉族杂处同住。

(五)婚丧

四川满族近现代的婚嫁习俗,出现了本民族古俗和汉族婚俗相融合现象。他们的婚俗文化里显然渗透了较多的汉族风俗色彩。男女结婚大都采纳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算八字,送彩礼。但与四川汉族不同之处在于汉人接新娘是在白天,满人却是在半夜。男方于当天设宴招待宾客,当晚二更时许才摆酒席,一直吃到三更才用花轿去接新娘。新娘下轿后,先同新郎跪拜弓箭,然后拜天地后才入洞房。在洞房门口有两个武士手执出鞘的雪亮大刀,一待新娘进房,就哗啦一声将刀插入鞘内,使新娘受到惊吓,为的是“镇煞去邪”。新娘进房后,等候新郎来揭盖头,揭了盖头后新郎出去,剩下新娘一人,面对喜神盘膝坐定,如同参禅一般,不许伸腿和大小便,不吃不喝,更不能讲话,一直坐到次日午夜,整整 16 个小时。

清时四川成都旗营丧事也有许多与汉人不同之处。满族祖先在东北时曾采用过土葬、火葬、树葬、兽葬、水葬等丧俗。进入四川地区后,由于受汉族土葬习俗影响,满族的土葬之俗历经了数百年之久。不过,丧事全由出

嫁的姑奶奶作主,遗体横卧堂中,头朝东脚向西,姑奶奶未到不得入殓。出殡时,孝子持白幡,男左女右,女婿持小红幡,待姑奶奶到场并允许时,孝子方敢填土。如姑奶奶不做声,任何人都不得擅发号令。

(六) 节日祭典

为保持满族的传统,成都满族旗人尤重祖宗家规。每年大都要举行一次祭祖典礼。这一典礼一般在每年农历的二、八月,择其上旬或中旬吉日进行。祭祀先在祖先神位前摆设供桌,安放香蜡烛台,燃点高香大蜡,以示庄严隆重,也带有喜庆气氛。祭祀时要燃放鞭炮,男性家长带着男性家属分长幼行礼,家长奠酒,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是女性家长带领女眷行礼。有时这两个步骤也是同时进行的。满族祭礼还有另一种形式是祭“祖宗竿子”,在祭典之前,先从匣子中取用五色线合成的长绳拴在竿上,绳上还拴有四五寸长的红蓝布条,红色代表女性,蓝色代表男性,各写历代男女名字。出生一人,就增加一条,女子出嫁后就取下一条送到丈夫家里。祭祀完后,五色线和红蓝布条仍被庄重地放回匣子中。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满族的习俗不断发展变化着,由于汉俗的影响渗透,加快了这一过程。一些旧俗被改革、淘汰,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另一部分也向着从简的方向发展着,

不断为这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注入新的活力。

二、满族的尚武精神与体育运动

满族原本是我国北方的骑射民族,尚武之风颇盛。到了四川,虽然环境有了改变,但尚武之风犹存。

居住在成都的满族同胞提倡“清语骑射”。其中所谓“清语骑射”指的就是要熟悉弓马,保持满族勇武的民族传统。在嘉庆、道光以前,满城内的满族人的生活较有规律,早上黎明即起,漱洗之后,奏乐升旗。上午弓马骑射,刀光剑影,打杀之声不绝。每年大操,将军副都统在演武厅检阅升降官兵,鼓励勤习骑射。但是,咸丰以后,洋烟传入,不少人吸之成瘾,骑射之风逐渐松弛。清时,亦有少数八旗子弟由于喜习拳棒,而医术亦精。除了名扬中外的正骨科专家杜自明老先生外,在成都地区,较有名的还有安明山,镶蓝旗人;有子林,镶白旗人。

三、满族的宗教信仰

满族在东北时信奉萨满教,有一系列繁杂的祭祀活动,如祭祖、祭天、祭星等。来到四川定居后又受到佛教、藏传佛教影响,也崇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关圣帝、蒙古神等。佛教与其他宗教的渗入,正是满、汉、藏、蒙文化融合反映。在四川满族的宗教信仰上,虽信仰佛教,但仍沿袭萨满教礼

仪。祭祀时,先将佛、菩萨、关圣帝等请至户外南墙山神龛里,然后再杀猪祭祖、祭天。萨满教的宗教活动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民国初年,祭祖祭天活动还很兴盛。但由于时代潮流的冲击,科技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萨满教的宗教活动如今已逐渐消失。

四、满族与四川京剧

清末京剧传入成都,但仅限于满族中间。当时的八旗子弟已对骑射淡漠,而好声色游乐。那时满城内有座坐落在荷花池畔的小茶馆,终日弦歌

不绝,为数不少的满族戏迷来此操琴吊嗓,吹拉弹唱,于是这座小茶馆竟成了成都京剧的“发源地”。当时的成都人尚不知京剧为何物,对满族这种与川味大相径庭的唱腔,统称为“京二簧”。清朝被推翻后,汉人也加入茶馆坐唱,于是成都京剧逐渐发展起来。园内茶馆成为成都满汉京剧爱好者最早聚会的中心,取名为“永聚茶园”。满族最先把京剧引入成都而且再传至其他地方,有力地促进了四川文化艺术的发展。